

中国大陆的民族生态研究 (1950 ~ 2010 年)

尹绍亭*

摘要: 60年来,中国大陆的民族生态研究成果显著,相关的学术史著作对此已有论述,但尚缺从具体的理论研究取向进行的审视和梳理。根据中国大陆民族生态研究的多样性,可将其归纳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经济文化类型和文化生态区、生态人类学、民族植物学、民族生态学、环境人类学六个研究类别,对其逐一评论,可以对此领域的研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回顾。我国民族生态研究理论的发展,与国际学界关系密切;而目前我国民族生态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本土化理论创新和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 中国大陆; 民族生态; 评述

民族生态研究或言人类学生态研究,历来为大陆学者所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此领域曾有不少研究的积累,对此,相关的学术史著作已有一些介绍,^①不过感觉尚有修正、补充、梳理的空间。民族生态研究是一个相当宽广的领域,其间其实有多种学术取向的研究,而以往的学术回顾不是以“生态文化”统之,便是以“生态人类学”概括,失之笼统。有鉴于此,本文拟按学术取向划分民族生态研究的门类,对大陆60年来民族生态研究的状况作一个简略的回顾。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国家主导的民族调查研究,^②由于当时深受苏联民族学的影响,所以也被视为“苏维埃学派”。^③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见于国家民委主持编写的五种丛书。

这一时期的民族调查研究,皆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指导。该进化论认为,迄今为止的社会发展史是五种社会形态依次进化的历史。而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则在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进步更新,促进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从而使社会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

展演变。

中国大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的3次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查以及五种丛书的写作出版,都是在进化论的指导下完成的。从此理论的视角、观点、表述框架、概念、术语等来看,显然与当时西方学界流行的文化生态学相去甚远,然而其收集整理的大量资料,却是文化生态学研究视为自身主要研究范畴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仅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为例,纵观其写作体例,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大都包括如下内容:概况、经济、社会、历史、物质生活、宗教信仰、婚姻家庭等,其中经济和社会所占分量最大。在《丛刊》的“概况”里,无论详略,通常都有自然地理的描述。而“经济”的写法,一般先说当地的经济类型,然后重点记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生产力”的章节中,可以较详细地了解各少数民族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和耕作制度以及劳动的投入和产出等;在“生产关系”的章节中,则可以了解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土地制度、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的相互关系等。“社会”章节记录的是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和习惯法等。“物质生活”涵盖衣食住行。“宗教信仰”记录一年中所举行的各种宗教仪式及其与生产活动的关系,有的也把

*作者简介:尹绍亭,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昆明,650091)。

①瞿明安《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第二十三章“中国的生态人类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尹绍亭《人类生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载中央民族大学编《中国民族学纵横》,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杨圣敏《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 民族学》第四章“主要研究成果与焦点问题”中的“环境问题与发展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等。

②“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一名,见于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说明”中)。

③杨圣敏《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 民族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页。

“历法”加入其中。上述这些散见于不同名目下的资料，无疑就是时下生态研究十分关心的内容。

如果以现在的眼光、从生态研究的角度审视上述学术遗产的话，那么其价值主要在于给后世留下了大量业已消亡、不可能再生、再调查的文化生态资料，其中如独龙族、景颇族、佤族、傣族、黎族等的调查资料，比较深入详细，尤为可贵。

二、经济文化类型和文化生态区的研究

上述已知，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的民族研究曾深受苏联民族学的影响，“经济文化类型”即为当时中苏合作研究的成果。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主要着眼于生计和物质文化差异，将东亚各民族的生计形态划分为3种类型：第一是狩猎、采集和捕鱼起主导作用的类型；第二是以锄掘（徒手耕）农业或动物饲养为主的类型；第三是以犁耕（耕耘）农业为主的类型。3种类型首先被认为是社会发展阶段进化的差别，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的表现；其次，被认为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密切关系。^①

20世纪90年代，这一理论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以“社会文化类型”取代了“经济文化类型”之称，其次是类型的划分也与20世纪50年代有所不同。新的划分也分为3种类型：一是渔猎采集经济文化类型，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北部，包括讲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族诸语言的赫哲、鄂伦春和部分鄂温克族；二是畜牧经济文化类型，包括草原、戈壁草原、盆地和高原，划归其中的民族有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裕固、塔吉克、藏、达斡尔等民族；三是农耕经济文化类型，它的亚类型可粗略分为山地游耕、山地耕牧、山地耕猎、绿洲耕牧、水田稻作和平原集约农业等。与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文化类型相比，新的社会文化类型划分虽然仍然主要依据社会发展阶段论，然而“少数民族的生计与地理生态环境适应”的观点也同时出现于论著当中，理论参照的视野显然扩大了。^②

类似于经济文化类型划分的研究，20世纪

80年代有民族地理文化区研究的尝试。例如以云南为对象，依据以生计为核心的文化差异，将云南划分为4大文化区8种文化类型。^③民族地理文化区研究的意义，乃是希望在当时彻底否定环境决定论而回避谈环境作用的背景下，重新审视生态环境与文化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受国外生态人类学的影响，又有结合生态人类学理论介绍的“生态文化区”的研究。该研究将我国大陆划分为3个主要的文化生态区：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渔猎文化区，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文化区，长江中下游水田农业文化区。除此之外，还可以划分若干较小的文化区，例如南方山地耕猎文化区，康藏高原农作及畜牧文化区，西南山地火耕旱地农作兼事狩猎文化区。该研究通过对国外生态人类学的介绍和本土生态文化区的划分，意在强调大陆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调适和生态研究的重要性。^④

经济文化类型、文化区域、生态文化区分类的研究，都讲文化的空间分布，显然有人文地理学的印迹，而其源头还可以追溯到美国人类学者威斯勒（C. Wissler）和克鲁伯（A. I. Kroeber）的文化区域（Cultural Area）理论。目前，传统的文化“类型”和“区域”在急剧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大多已经面目全非，同质的“类型”和“区域”越来越少，不过对于地域研究而言仍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三、生态人类学的研究

中国大陆生态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云南是较早开展其研究之地，而且首先把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作为研究对象。^⑤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伊始，大陆学者能够获得的国外的学术信息还十分有限，对于国外文化生态学和生态人类学的研究状况知之不多，研究的理论方法多半靠在田野中逐渐探索。不过，云南学者的研究却颇获国外学者的认同，尝试运用的“人类生态系统”概念及系统分析方法亦引发了同行的兴趣和好评。^⑥此后云南的生态人类学在国际合作的平台上不断发展，研究领域不断扩大。诸如“传统知识与生物多

①林耀华等《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载林耀华著《民族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②林耀华《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类型及其社会主义现代过程》，《民族学研究》1991年第6期。

③尹绍亭《试论云南民族地理》，《地理研究》1989年第1期。

④参见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一书之第三章“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⑤参见尹绍亭《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等等。

⑥尹绍亭《基诺族刀耕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基诺族刀耕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续）》，《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

样性研究”、^①“湄公河流域民族生态研究”和“亚洲季风区生态史研究”、^②“红河流域文化生态研究”、^③“东南亚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④“水文化与环境保护研究”、^⑤“少数民族传统水利灌溉研究”、^⑥“灾害研究”、^⑦“传统知识的发掘整理和应用研究”、^⑧等等,均为当代学术前沿课题。上述课题,有的成果成效显著,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有的还缺乏应有的深度,理论和方法的提升尚需时日。此外,云南大学人类学系于1999年开设生态人类学课程,并设立了民族生态学学位,陆续培养了一批学、硕、博士研究生,云南大学因此成为大陆最早的生态人类学教学科研基地之一。

20世纪90年代之后,涉足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多了,成果不少,仅就影响较大的团队性、地域性的研究而言,目前除云南之外,还有黔湘和北方。

黔湘地区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近几年比较活跃。吉首大学近10年围绕生态人类学学科建设,大力推进科研教学,经过数年的努力,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并形成了自身的研究特色。该团队在理论和方法上有3点主张:一是强调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文化生态的发展和演变;二是主张全面把握一个民族的生态行为及其后果;三是不满足于单一民族的生态问题研究,认为不应忽视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⑨2006年,吉首大学实施“中国西部本土生态知识的发掘、整理、利用和推广”项目,联合西部数所大学和科研机构,

在湖南、贵州、广西、重庆、四川、内蒙古、宁夏、青海8省区设立了17个田野点,进行了为期3年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⑩黔湘学者对本土生态知识不遗余力地发掘整理,在研究中较大跨度地涉入自然科学,锐意创新学术概念的倾向令人印象深刻。不过,如何立足于自身学科、把握好与自然科学交叉结合的“度”,是需要探讨的问题;而且一些新的学术概念的运用,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和学界认同。

北方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性突出,草原游牧、绿洲农业、干旱区水利、驯鹿文化等,为该区生态人类学研究的特色学术资源。与云南、黔湘相同,少数民族传统生计的知识、智慧,生态、社会环境的变化引发的社会文化变迁,外来农耕文化与草原畜牧文化的接触、碰撞,移民增加带来的种种生态问题,工业化导致的资源恶性开发、环境污染破坏以及社会公正、住民权益和民族问题等,乃为目前生态人类学、环境人类学应接不暇的研究题材。从研究队伍来看,涉足北方研究的学者更众、机构更多。北京以中央民族大学为首的若干机构、^⑪内蒙古自治区以内蒙古大学为首的若干科研机构、^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新疆师范大学为首的若干机构以及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甘肃社会科学院等,均有致力于北方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学者。^⑬2011年8月,内蒙古大学和贵州大学在呼和浩特市联合举办“‘生态智慧:草原文明与山地文明的对话’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66篇论文,大部

①20世纪90年代中期,云南成立“云南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研究会”(简称CBK),做了大量研究,影响很大。

②参阅尹绍亭,[日]深尾叶子《雨林啊胶林——西双版纳橡胶种植与文化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生态史研究》,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日]古川久雄,尹绍亭《民族生态——从金沙江到红河》,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尹绍亭,[日]秋道智弥《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日]秋道智弥,尹绍亭《生态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等。

③郑晓云,杨正权《红河流域的民族文化与生态文明》,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等等。

④许建初《生物多样性保护》,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4年,等等。

⑤熊晶,郑晓云《水文化与水环境保护》,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等等。

⑥高力士《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灌溉与环保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郭家骥《西双版纳傣族稻作文化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等。

⑦李永祥《关于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以云南省哀牢山泥石流为个案》,《民族研究》2008年第5期,等等。

⑧尹仑《江边藏家——和谐德钦论文集》,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8年;《应用人类学研究——基于澜沧江畔的田野》,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10年。

⑨杨庭硕《生态人类学导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

⑩丛书至今已出版杨庭硕、罗康隆等著的《生态人类学导论》、《发展与代价》、《本土生态知识引论》、《传统文化中的生计策略》4种。

⑪杨圣敏教授基于新疆的长期调查研究,提出“干旱区文化”的概念,著有《环境与家族:塔吉克人文化的特点》,《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等等。包智敏,任国英《内蒙古鄂托克旗生态移民的人类学思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5期;《内蒙古生态移民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等。麻国庆《开发、国家政策与狩猎采集社会的生态与生计——以中国东北大小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族为例》,《学海》2007年1期;《“公”的水与“私”的水,游牧和农耕蒙古族“水”的利用与地域社会》,《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等等。色音《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等。

⑫齐木道尔吉和恩和在内蒙古草原做了数个基于生态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阿拉坦·宝力格《牧区发展模式与环境保护——对一个蒙古族牧民村落的人类学考察》,载胡春惠,徐杰舜主编《少数民族——中国的一个政治元素》,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2009年5月,等等;阿拉腾《文化的变迁——一个嘎查的故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等等。

⑬崔延虎曾在阿尔泰山区的哈萨克族和乌梁海蒙古族中做了9个月连续调查,他和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呼勒巴特尔等人的成果曾编入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系Caroline Humphrey教授与David Sneath博士主编的6本英文学术著述中。

分是北方学者研究草原文化生态的文章,北方生态研究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①不过,相对而言,北方生态人类学研究群体虽大,却比较分散。如何总结已有成果和经验,促进交流合作与发展,也许是北方民族生态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

新近中国大陆生态人类学的开拓,两个地区可以期待:一是厦门大学设立了“海洋生态人类学”研究方向;二是新疆石河子大学最近建立了“绿洲生态人类学研究中心”,均为崭新的研究领域。^②

四、民族植物学的研究

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于1896年由美国学者哈什伯杰(J. Harshberger)创立,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民族植物学是一门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相互作用的跨学科的学科,它建立在植物学、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生态学、语言学、药理学、农学、园艺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之上。经典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主要从事民族植物学的调查、记载、编目和分析评价。^③民族植物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被介绍到大陆,云南西双版纳是大陆民族植物学产生的摇篮。1987年,昆明植物研究所成立了大陆第一个“民族植物学研究室”。1990年,昆明植物研究所承办了第二届国际民族生物学(The 2nd International Ethnobiology Conference)大会。1990年至2002年期间,与民族植物学相关的10多个国际会议和培训班相继在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和新疆举行。期间云南的多个科研机构以及中国医科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等10多个单位和上百人次获得过众多国际组织提供的科研资助。这一时期,大陆的民族植物学家还频繁帮助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度、不丹、蒙古、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进行人员培训、机构建设和项目指导,为促进亚洲民族植物学的发展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大陆民族植物学的研究,

起步阶段系采用美国通行的调查、记载、描述、编目那样的常规方法;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结合采用美国东西方中心提出的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为依据的农田生态系统综合评估方法,80年代后期,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开始进行应用研究和推广试点工作,重点开展了资源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与发展、农村社区发展、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5个领域的研究。^④

大陆民族植物学从一开始便重视与民族学的结合,云南两个学科共同创办研究机构,培养研究生,保持了长期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在人类学方面,也产出了一批民族植物学和认知人类学的成果。^⑤

30余年来,大陆民族植物学发展迅速,成绩显著,一度走到国际前沿。问题与不足大致有4点:一是学科建设不够完善,二是社会认知度不足,三是实际应用有待加强,四是研究地区和研究领域分布不平衡。^⑥

五、民族生态学的研究

民族生态学(Ethnoecology)研究特定文化传统的环境知识,它涵盖民族生物学及其诸分支学科,如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民族昆虫学等。土著民族对其生境“认知”的传统知识,自然资源的分类知识和利用保护方式是民族生态学考察的核心。大陆最早的民族生态学研究亦见于云南。^⑦教学方面,云南大学于2000年最早设立民族生态学硕、博士学位,不过其教学研究方向侧重于生态人类学。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院是大陆第一家设立民族生态学研究学位的单位,科研取向多为面向国际和国家的民族生态的政策性研究,同时关照国内民族生态的基础性研究。近年来,他们实施了“生物资源知识产权战略问题研究”、“全国重点生物物种资源调查专项——民族地区传统知识调查”、“民

①参见内蒙古大学,贵州大学《“生态智慧:草原文明与山地文明的对话”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8月。

②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曾少聪教授倡导海洋生态人类学研究。从2008年开始,他着手培养此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其著作有《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等。新疆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崔延虎教授现兼职新疆石河子大学“绿洲生态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开创绿洲生态人类学研究新领域,并已发表《绿洲生态人类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游牧民定居的再社会化问题》、《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保护区旅游资源开发》等论文。

③[美]盖利·J·马丁《民族植物学手册》,裴盛基等编译,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98年。

④裴盛基,淮虎银《民族植物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应用》,载《应用民族植物学——人与野生植物利用和保护》一书之第九章,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4年;裴盛基,王春《应用民族植物学》,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等等。

⑤参见尹绍亭、秋道智弥主编的《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及秋道智弥、尹绍亭主编的《生态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两书中的若干论文和崔明昆的新著《象征与思维——新平傣族的植物世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等。

⑥裴盛基,淮虎银《民族植物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应用》,载《应用民族植物学——人与野生植物利用和保护》一书之第九章,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4年;裴盛基,王春《应用民族植物学》,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等等。

⑦裴盛基《用民族生态学的观点初探滇南热带地区的轮歇栽培》,《热带植物研究》1986年卷。尹绍亭《基诺族刀耕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基诺族刀耕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续)》,《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

族地区传统知识调查与文献化编目”和“民族生物学及生物资源利用技术创新引智基地”、“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支撑技术——民族地区传统知识数据库建立”等重大项目。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特别丰富的国家。在国家层面，中国虽然在近年的立法中，已开始关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问题，但至今尚没有完整的政策体系和法规体系。有鉴于此，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生态学将此作为重点，研究内容包括介绍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概念，分析《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他相关国际公约、国际论坛有关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配，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的政府间谈判的进展和趋势；阐述相关国际组织在此领域的关注和世界各国已有的经验、做法与案例；并在分析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保护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促进其惠益分享的国家战略、法规政策体系和相关措施。^①

六、环境人类学的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环境人类学(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在国际学界流行开来，成为具有取代生态人类学趋势的一个新的学科概念。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重点是人类与其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环境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除此之外，还涉及政策、市场、环境保护运动等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地球环境、资源保护等与环境相关的问题。所以环境人类学可以看做是包括了生态人类学的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领域。^②相对于国际学界，中国大陆至今仍然主要使用生态人类学的名称，环境人类学仅见于个别研究和译文。不过，如果从环境人类学的取向和研究对象来看，大陆相关的研究早已开展，因为许多生态人类学研究事像的变迁，均已涉及国家、政策、市场、资源等的分析。如前所述，云南近10年来所进行的湄公河流域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滇南开垦雨林种植橡胶的研究、水文化和水资源保护的研究、发展和开发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澜沧江等大河建筑大坝的研究、泥石流和干旱等灾害的研究、生态移民的研究、旅游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人类活动

与气候变化的研究、境外罂粟替代种植的研究，等等，都属于环境人类学研究的范畴。而在贵州、四川、湖北、广西、西藏、新疆、甘肃、内蒙古、东北等地区，类似的研究亦很多。虽然如此，然而局限性显而易见：其一，目前大陆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研究对象绝大多数仍然集中于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大型、开放社会的研究极少；其二，研究题材大多沿袭传统，诸如工业、矿产、化肥、农药、城市化等造成的环境污染破坏、气候变暖、资源短缺、人类健康和食品安全危机等，尚少有涉足。鉴于目前环境问题层出不穷的局面，环境人类学必将更受重视，相信会有更多的学者投身其中。

七、余论

以上简要评述了中国大陆60年来民族生态研究的状况。60年间，作为被研究者的各民族及其生境在不断变化，而作为研究他者的学者们的学理也在不断变化。梳理我国民族生态研究理论的发展，不难看出与国际学界发生的密切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技术决定论（或称生产力决定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人类学“文化区”学派主张的环境可能论和苏联民族学的经济文化类型，同时期及至70年代把生态学适应原理引入人地关系研究的文化生态学和进而运用生态系统概念进行分析的生态人类学，70年代之后包括文化生态学、生态人类学、民族植物学、民族生态学、环境人类学、政治生态学等在内的多种生态学的蓬勃发展，都给予我国民族生态研究很大的影响。和其他民族学人类学的各分支学科一样，目前我国民族生态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本土化理论创新和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关于此，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必须打破学科壁垒，促进跨学科合作研究的机制，努力开掘跨学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二是不能满足于时下论著众多然而不少平庸的状况，应当把产出精品、经典作为追求的目标。

（责任编辑 段丽波）

^①薛达元《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民族地区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案例研究》、《民族地区医药传统知识传承与惠益分享》、《遗传资源、传统知识与知识产权》，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②[美]Patrica K. Townsend《环境人类学》（日文版），[日]岸上伸启等译，东京：世界思想社，2004年。